

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苏化问题

付世明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1)

[摘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加入苏联较晚,与西方联系密切,反苏势力长期存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一地区影响薄弱。苏联政府强迁反苏势力,强化党建工作,试图用“双语制”和移民来达到苏化目的,强权导致地区民族主义意识形成。恩威并用也未达目的,反而导致该三国充当了苏联解体的急先锋角色。

[关键词]苏联;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苏化;俄罗斯化

[中图分类号] K5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10)05-0100-06

从苏联末期的危机及其解体可以清楚地看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即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与俄罗斯人(包括俄罗斯化的其他民族)为主体的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最为复杂,这种关系不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且独具特色。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外高加索三国、中亚五国)相比,这三个小国正式加入苏联的时间较晚(1940年),也就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制度确立以后。这三个共和国的加入使苏联的领土面积几乎接近了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帝国的行政区划版图,苏联政府的帝国意识形态也随之加强。莫斯科当局还把西方世界称之为俄罗斯“飞地”的加里宁格勒(原称“哥尼斯堡”)与该三国连成一片,成为苏联西北边疆的战略“缓冲带”。这样,原属该地区各共和国的最高权力转入莫斯科中央政府,地方的各级行政权力也很快落入俄罗斯人(也包括俄罗斯化的苏联其他民族)手中。

彼得一世发动“北方战争”打败瑞典之时,根据1721年双方签订的《尼斯塔特条约》,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划归俄国,而立陶宛是在“三次瓜分波兰”时划归俄国的。从彼得大帝改革之时起,沙俄政府就把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作为废止诺夫哥罗德与汉萨同盟贸易之后俄国面向西方世界的窗口,在强制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的同时,却给予这一带更大的自治权,致使该三国俄罗斯化程度一直很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三国才获得独立。正如时任立陶宛共和国总统的阿里吉达斯·勃拉召斯卡斯在1993年所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脱离俄罗斯仅那20年(1918-1938),先在沙皇俄国近200年,之后又在苏

联半个世纪^[1]俄罗斯化政策强制推行200多年,到卫国战争爆发,苏联境内的100多个民族多数已经俄罗斯化,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则有所不同。

卫国战争以前,苏联政府在这一地区行使各种权力的时间不长,各项苏化(СОВЕТИЗАЦИЯ,苏维埃化、苏联化,以下简称“苏化”)政策刚刚付诸实施。然而,正是这短短的1-2年时间里,苏化政策的落实引发了政治冲突、民族冲突和领土冲突,使这三个共和国一直成为苏联政府甚为关注的“问题地区”。

一、拼凑战时各级亲俄政权

1940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正式加入苏联之前,苏联的陆海空三军就已经根据上一年两大国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附加秘密议定书》分别进驻塔林、里加、维尔纽斯以及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这就为斯大林政府实施苏化政策提供了政治前提。卫国战争打响之前,苏联政府对于该地的反苏势力实行严格的清剿政策,先后两次大规模强迁反苏派。1941年6月14-15日夜,荷枪实弹的苏军根据驻地代表及其亲俄代理人的情报仅用几个小时就将当地反苏派约6万爱沙尼亚人、3.4万拉脱维亚人、3.8万立陶宛人驱赶到火车站的货车上,分别送往西伯利亚流放地。据经历这场磨难的当事人估计,约4%的爱沙尼亚人、1.5%-2%的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遭到苏联政府的强迁。^[2]反苏势力的工作岗位和住房被负有特殊使命的俄罗斯人占据,一些城镇的重要工厂设备被拆除,机器、粮食、牲畜及农具等也被运到苏联内地。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尽量减少损失,更有效地打击法西斯战争集团,以斯大林为首的

[收稿日期] 2010-04-15

[作者简介] 付世明(1952-),男,辽宁沈阳人,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苏联政府针对国内的敌对人员采取的对策是流放与强迁,这也是战争条件下的迫不得已。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后,莫斯科当局的接收大员很快进驻。苏联政府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到爱沙尼亚、维申斯基到拉脱维亚、外交部副人民委员捷卡诺佐夫到立陶宛作为苏联政府的全权代表,这三人实际上主持这三国的常务工作。1940年秋,在他们的主持下,恢复了十月革命后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涅奇库斯、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卡利波尔金、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罗塔姆的工作。之后,又举行了由莫斯科操纵的所谓选举,三国的亲苏政府分别成立。由于当地与西方国家联系较多,十月革命前就存在的各亲德团体很快演变为反苏势力。与此同时,历史上形成的亲俄势力也在苏联官方的支持下从事隐蔽活动,服务于苏俄政权的地下工作者也潜伏下来,在艰苦的条件下长期为苏联工作。在苏联政府全权代表的坐阵下,打击反苏势力和落实苏化政策就成为战时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致力于三国独立的反苏派政治家把希望公然寄托于德国法西斯集团,立陶宛东部山区甚至成立了“林中兄弟会”,在国内外反苏势力的支持下从事武装抵抗运动。^[3]苏联政府从战争的大局出发,有选择性和有针对性地打击这些反苏派,旨在进一步壮大亲苏势力,伺机彻底摧毁这一地区的各种反苏组织。

这三国高级干部问题的解决对莫斯科当局来说不难,因为有驻军在附近,任命和收罗当地亲俄派势力就可以做到。在战争期间,这一地区反苏势力甚嚣尘上,三国领导人做了最大努力也不能控制当地的局势,莫斯科当局对此甚为不满。1944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苏共中央在组织工作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在这三个共和国分别成立隶属斯大林中央政府的“特别委员会”,各委员会主席由苏共中央直接任命:苏斯洛夫被任命为立陶宛主席,沙塔林被任命为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两委员会主席。为时不久,梁赞诺夫被派赴拉脱维亚任主席职务,沙塔林仍继续担任爱沙尼亚的主席职务。该决议同时强调,三国特别委员会主席进入各共和国核心领导机构,并且在莫斯科与各国之间发挥中介职能。^{[4](p358)}这些来自莫斯科的官员定期向中央汇报工作,表面上看是合作共事,实际上限制了当地干部行使国家主权的使命。

1944—1945年约一年半时间里,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仅召开了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莫斯科全权代表与该共和国政府领导人的会晤也只限于非正式的接触。实权掌握在代表莫斯科当局的俄罗斯人手里,但当地官员的提议大多还是得到了苏共中央的采纳。第一书记均由当地民族的人士担任,莫斯科当局委任的特命全权代表为第二书记,而在官方

的正式场合这些俄罗斯人也未必出现。但卫国战争爆发后,三国均发生了反苏起义,游击队在农村活动猖獗。苏联政府授权内务部官员可以当场击毙任何反苏分子,还有权烧毁这些人的房屋、农场及其村庄。这些严厉的镇压措施却导致游击队和其他反苏组织的壮大。立陶宛的形势更为复杂,“林中兄弟会”不但抢劫前线急需的军用物资,还武装袭击地方干部,给当地后勤供应与苏化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中下级干部问题最难解决,原因是苏方代表很难深入乡以下的村级组织开展工作,中央政府的决议只能落实到乡一级。苏军控制了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农村则成为游击队的天下。游击队的反苏活动得到当地大多数人的支持,许多农民参加了这场打击苏军的游击战争,德军攻入之际游击战达到高峰。当地农民最怕“集体农庄”这个词,也最反对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提法。鉴于战争的特殊需要,苏联政府沿袭沙俄时代对这一地区实施的自治政策,暂时放弃农业集体化的推行工作,允许个体经营,旨在维持当地的社会治安,待战后另行处理。三国之中爱沙尼亚的领土面积最小,人口也最少(当时不足100万),当地人对俄罗斯人的大批涌入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早在1940年正式加入苏联后就发生了“驱逐俄罗斯人事件”。不过,对来自苏联内地的驻军以及走上领导岗位的俄罗斯人没有理由反对,特别是那些用专业技术知识向当地提供服务的俄罗斯人。在战争的危急形势下,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成为苏德两个大国政治交易的筹码,当地的各族人民对此是理解的。不过,在俄罗斯人近200年统治下(1721—1918),爱沙尼亚人与拉脱维亚人对俄罗斯的评价负面一直大于正面,在立陶宛甚至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例如:商贩的唯利是图以及苏军战士经常醉酒的不检点行为,使当地人认为这些外来俄罗斯人没有教养,连手都洗不干净,这种长期形成的对统治者的成见不是很快能消除的。在这一带各族人民的心目中,苏联就是历史上俄国的继续,是俄罗斯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也是被战争破坏得不成样子的大国。再有,在外国人看来,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人具有西方人形象,与西方世界联系紧密,他们不承认苏联是一个文明的国家,更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苏联的政治制度是最民主的,为什么还仍然限制公民权和选举权?类似敏感、刺眼而又具挑衅语气的报道不时出现在官方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应该不是偶然的,几经“清洗”的各种官方媒体又很快转到当地人的立场上讲话,说明了“民心不可违”的普遍真理。

战争期间,三国的政府与地方行政部门中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所占的比例大大低于外来的俄罗斯人。苏联政府难以找到忠诚苏维埃制度的当地人,只好安排俄罗斯人担当各级领导,否

则很难在各国开展日常工作。一直到1944年战局有利于苏联之后,为了缓和当地的紧张局势,苏联政府才选拔了一些俄罗斯化的波罗的海沿岸各族青年进入基层苏维埃。从1945年7月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在这一地区苏维埃机关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中,爱沙尼亚人占80%以上,拉脱维亚人占60%以上,立陶宛人占40%。随着战争形势的明朗化,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各主体民族干部数量明显增加,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仅立陶宛共和国的30个市级和县级苏维埃的书记中就有24名立陶宛人,占80%。^{[4](p360)}然而,第二书记均是俄罗斯人(也有少量俄罗斯化的苏联其他民族),他们掌握各地的实权,尤其是内务部和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均为俄罗斯人。

二、强化苏共的党建工作

鉴于十月革命后德国势力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颠覆活动,还在战争后期,苏联政府就决定在这一地区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从共和国政府到广大农村的各级管理均实行领导岗位的“布尔什维克化”。然而,战后各共和国的中低级党员干部明显不够,也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干部的缺额问题。据解密的史料公布,当时立陶宛中央机关的苏共党员干部仅占5%(市级与县级苏维埃的党员干部仅配齐5%);爱沙尼亚中央机关的苏共党员干部缺额为57%,拉脱维亚中央机关的苏共党员干部不足40%。另据苏共权威机构在1945年末的统计,立陶宛总共有3536名党员,拉脱维亚有3592名党员,爱沙尼亚有2409名党员(其中都包括预备党员)。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当地民族的党员数量在其中不足50%;立陶宛族党员为112名,拉脱维亚族党员为126名,爱沙尼亚族党员为961名。^[5]这其中有一半的当地民族党员被安排在安全部、内务部以及军事等机要部门工作,其他部门党员干部的缺额状况就更严重了,特别是农村基层的当地民族干部更是奇缺。根据三国政府的请求,莫斯科当局决定把在内地入党的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尽快抽调一些,让他们在这一地区承担中下级领导机构的日常工作。据1945年2月联共(布)中央人事部统计,全苏联总共有4346名拉脱维亚族党员、1228名立陶宛族党员、1804名爱沙尼亚族党员。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紧接着在1945年3月10日通过决议,由中央人事部出面,在全苏内地抽调300名拉脱维亚族党员、200名爱沙尼亚族党员、150名立陶宛族党员,让他们各自回家乡担负领导工作,缺额的岗位仍由当地俄罗斯人担任。^[6]尽管如此,当地人仍认为俄罗斯人垄断了这里的各级领导职务,因为,凡是有反苏嫌疑的各民族当地人是不能担当领导重任的。然而,从全苏各地抽调波罗的海民族干部的工作并不像斯大林政府所想像的那样容

易。过了半年多,这些在册的抽调民族干部大多未能到位,这让俄罗斯大员甚为恼火,工作人员也无法解释。到1945年11月,负责这项工作的人事部负责人向马林科夫报告:中央政府决议的150名立陶宛族内地抽调干部实际到位者仅为35人,其他两个加盟共和国的抽调干部赴任状况也很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大多数被抽调的民族干部都因健康、家庭和年龄等正当理由不能赴任。到1945年底,莫斯科中央政府从其它加盟共和国抽调了540名拉脱维亚族干部回到家乡工作,一度缓解了当地干部问题的压力。^[7]其实,从族属上来看,这些被抽调回乡工作的干部只是出生在这三个国度,他们之中大多在苏联内地长大,许多人连母语都不能讲了,甚至与祖籍失去了同一性;有些甚至认同于俄罗斯族,根本就不想回去。莫斯科当局把这些抽调者视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土著干部,但在当地人眼里却被视为外乡人,即便他们能讲当地语言,也不会被认同为乡亲,因为他们的回归是代表俄罗斯人行使权力,更何况他们之中的多数已经失去了本民族的特征,已被俄罗斯化,尽管他们工作很努力,也有亲和力,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的各项工作。

注意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反苏分离势力具有国际化的趋势,莫斯科当局要求抽调干部赴任之前必须在莫斯科的中央党校以及列宁国际学校进行短期培训,并且还强调,在当地提拔的青年干部也必须派到相关的“速成中学”培训。在对外宣传上,莫斯科官方倡导实行公文“双语制”,“尽早实现当地行政管理干部的本土化”,但同时规定当地的工作语言是俄语,不讲俄语的当地青年不但找不到工作,更不准担当基层领导职务。在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上,苏联政府十分重视党建工作,1946年的成果甚为可观: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爱沙尼亚人占60%;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拉脱维亚人占43%;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陶宛人占29%。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苏化工作较有起色,而立陶宛的“林中兄弟会”与农村游击队的存在是年轻人未得到苏维埃信任的重要因素,干部队伍的本土化工作很难开展。^[8]1945—1947年的两年时间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共产党组织的扩大主要靠外来的俄罗斯人来填补,一方面是由于当地的青壮年排斥苏维埃制度,另一方面,俄罗斯人掌权的各级党组织在征收当地青壮年入党的工作方面也较为慎重。可是,征收迁入的俄罗斯人(包括俄罗斯化的苏联其他民族)的入党工作却成果显著,外来人入党的数量激增:拉脱维亚的共产党员数量增长近五倍(党员与预备党员达21037名);爱沙尼亚的共产党员数量增长4.4倍(党员与预备党员数量达12965名),立陶宛的共产党员数量增加3.6倍(党员与预备党员数量达16202名)。^[9]三国苏共党员总量的增加一方面是

内地移民(一些人入党多年)的大量涌入,另一方面是转退的驻地军人就地安排工作的数量不断递增。这样,当地苏共党员的民族结构趋于国际化,但以东斯拉夫三大民族(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的党员为主,也包括少量俄罗斯化的苏联其他民族党员。

立陶宛的主体民族占 80% 以上,在这三国中人数最多,而当地苏共党员数量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其他两个加盟共和国,这也与该国武装反苏派的积极活动有关。解密的档案资料证实,该共和国的苏共党员之中立陶宛人仅占 32%,俄罗斯人占 54%,其他民族占 14%(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以及俄罗斯化的鞑靼人和犹太人等)。两年以后的统计资料更能说明问题:立陶宛人在该国苏共党员总量之中的比例下降到 18%,俄罗斯人的比例在其中上升到 59%,其他民族的比例上升到 23%。按绝对指数统计,这一时期立陶宛苏共党员的数量增加了 1.6 倍(从 1 127 人增加到 2 984 人);而当地俄罗斯族苏共党员的数量增加约 4 倍(从 1 901 人增加到 9 577 人),犹太族苏共党员数量增加 4.3 倍(从 238 人增加到 1 275 人),乌克兰族苏共党员的数量增长约 8 倍(从 143 人增加到 1 276 人)^[10]苏联政府强化党的建设作为苏化工作的首要任务,从而导致这一地区的干部队伍“布尔什维克化”。征收当地青年入党的工作确实有效地分化了一些反苏势力,对当地的苏化工作有成效,但也引发了新的矛盾。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斯涅奇库斯对此发布指令,限制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及波兰人(属西斯拉夫人)在该共和国内担当领导职务,并且强调一些领导职务必须由立陶宛人担任,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趋于激化的民族矛盾。到 1947 年,三个加盟共和国内各级领导岗位的当地人与俄罗斯人的比例均以各占一半为都能认同的指数,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到 50 年代初基本达到这一比率,而立陶宛 1956 年才基本达到^[11]

苏联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战后初期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较为审慎地推行苏化工作,但还是经常遭到当地各族人民不同方式的抵制,不同层面的冲突接二连三,归纳起来矛盾集中在以下群体: 1. 当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包括讲俄语的其他民族); 2. 老户与新户(1940 年后迁入当地定居的外族家庭); 3. 领导阶层内部(经历了旧制度磨难的当地各族地下工作者与在苏联内地度过艰苦岁月的新领导人) 这些矛盾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苏联政府只能采取行政压力、必要时动用武力来推行苏化政策。

三、地区民族主义成为苏化障碍

除了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包括内务部与安全部)由莫斯科中央政府任命外,以组织名义调入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中低级干部相继进入了一些重要企

业,其中包括相关部门在内地精心挑选的一批批青壮年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在土地规划过程中没收的公有土地上,苏联政府组织的欧俄中央区移民很快迁入。一些很容易避开当地监察机关审查而迁入的移民大多来自毗邻省份,这些从事农产品与工艺品贸易的生意人出入不定,很难控制。流动人口逐渐成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社会紧张局势加剧的另一来源,他们自然也是苏化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46 年苏联政府颁布“取消限制人口迁移法令”之后,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毗邻的普斯科夫州和诺夫哥罗德州的大量农民迁入,这首先引起爱沙尼亚当地居民的反感,还多次引发流血冲突。这年夏天,欧俄中央区发生粮荒,外来人抢购农副产物导致当地市场物价上涨 1—2 倍。与此同时,爱沙尼亚内务部记录了犯罪率上升的事实,部分原因是由于迁入爱沙尼亚的移民中混进了刑事犯罪分子。日丹诺夫在写给贝利亚的报告中表明苏联政府对该地政治局势的高度关注:爱沙尼亚共和国领导人彼洛夫担忧俄罗斯移民的大量涌入引发盗窃、投机倒把事件和物价上涨,伴随着谣言四起而导致地区局势恶化^[12]为了防止外乡人继续迁入,与俄罗斯毗邻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各乡镇农民甚至在边界设置栅栏,但无济于事。因为苏联内地的农民都知道这里的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地区,只要定居到这里都会过上好日子。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爱沙尼亚共和国政府多次向莫斯科当局请示禁止移民迁入,但收效不大,很多人的迁入是合法的。

各级苏维埃在几年之内培养了一批忠于苏联的民族干部,他们的阶级斗争观点得到当地社会下层的支持,也很快扭转了苏化工作的被动局面。然而,当地人排斥俄罗斯人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意识,不但拒绝与外来人接触,还阻止其后代学习俄语,甚至规定在本社区及家里必须讲本族语。新户居民要求当局保护讲俄语的权利,而老户居民则坚持使用本族语。“双语制”的推行使三国的公文必须先写俄语,再分别写当地三种语言,这一度让当地人不能接受。当地民众把不满情绪倾泻在移民身上,许多市区标识故意使用当地语言捉弄新来人,他们只是在上级的行政压力下才被迫接受“双语制”的行文方式。其实,当地的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很多能用俄语交流,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存在一批俄罗斯化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以及立陶宛人,能同时使用德语、法语和英语的“语言通”也大有人在,但他们就是拒绝使用俄语,拒绝与俄罗斯人合作。为加速这一地区的苏化工作,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提前完成之时,莫斯科至里加的铁路通车,内地来的苏联人激增,外国人还以为里加是俄罗斯的城市。拉脱维亚成为三国中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里加作为该国首都约有一半人口是俄罗斯人。^[13]

各国领导人均强调讲本族语,使用本族语也成为三国各自主权的象征。学校中俄语课时量增加经常遇到阻力,当地人从小就形成了抵制俄罗斯文化的习惯,即便看得懂和听得懂俄语也不愿讲俄语。苏联政府规定司法程序使用俄语,这让许多当事人难以接受,因为不懂俄语就不能成为司法机关诉讼过程的参与者,必须聘请俄语律师,这增加了当地人的经济负担。因此,各共和国领导人对本族语的使用问题均持强硬态度,甚至以“破坏列宁和斯大林制定的民族政策”为由来维护这一地区的自治权利。外来人大多住在新区,当地人大多住在老区,双方的交往存在一定的限制,加之当地人拒绝同化的社会意识在延续,故本族语社区完好地保存下来。与新区的交往成为基层民族干部的“专利”,这些人必须既懂本族语又懂俄语。与此同时,俄语的地位问题仍是莫斯科当局极为关心的,为外来人开办的俄语学校逐渐增多。随着苏维埃制度的确立,当地青年被允许走出封闭的社区,越来越多的当地青年进入苏联社会。这样,在本族语使用以及维护当地利益等具体问题上,三国的官方与民间的对苏态度逐渐趋于一致。

在打击富农和反苏游击队的同时,苏联政府清洗战时立陶宛抵抗运动成员、拉脱维亚的“特种兵团”参加者以及爱沙尼亚的“国防军”分子,甚至包括清洗与西方国家有亲属关系的当地普通平民,这些都成为当地苏化工作的重要内容。苏联政府通过党校培训和组织抽调方式充实了各级苏维埃,一批苏化的青年民族干部队伍成长起来。在立陶宛总共有1935人被提拔到共和国、市级苏维埃和县级苏维埃的领导岗位,其中立陶宛人为944人,约占总数的49%。^[14]莫斯科当局只能把一半的领导岗位让当地人担任,另一半无疑是让俄罗斯人或是俄罗斯化的其他民族人士来担任,这就是莫斯科当局标榜的“干部本土化”。然而,三国的反苏组织串通一气,地区形势几度恶化,甚至有转入内战的可能性,一些山区的农民与土匪没有区别,也无法分清。在苏军的打击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游击队1950年放下武器,立陶宛的反苏武装斗争持续到1952年底。据俄罗斯学者统计,1941—1952年苏联政府出于不同的动机总共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驱逐人员达20.35万,其中立陶宛占11.86万人、拉脱维亚占5.25万人、爱沙尼亚占3.24万人。^[15]这个数字与美国人的统计相比明显过于保守。但有一个事实是,每年都有从当地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反苏者。诚然,波罗的海沿岸的苏化工作服务于苏联的全球战略利益,对西方敌对势力发挥威慑作用的同时,也巩固了苏联的西北边疆,加速了全苏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进程。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进一步巩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领导人对莫斯科中央政府的态度逐渐趋于强硬:三国均坚持宗教信仰的独立性(立陶宛是天主

教,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则是新教),在“双语制”不同程度推广开来的同时,教堂的祈祷用语必须使用本族语。形势的发展迫使当地人学习俄语,这对各族青年人进入社会更为必要。立陶宛语和拉脱维亚语同属波罗的海语族,均属印欧语系,与俄语相近,但爱沙尼亚语却属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族,与俄语虽非同—语系,也属邻族语言,当地人学习俄语都不难。在对待“政治上不可靠者”的问题上,三国领导人的态度也趋于一致,都反对将当地富农以及战时反苏成员驱逐出境,几乎同时以正式文件呈报莫斯科中央政府。1946年3月,以卡别金和拉奇斯为首的拉脱维亚政府领导人呈文莫洛托夫,要求中央政府撤销“流放战时拉脱维亚特种兵团的决议”,理由有四:1.战时为德国服务的“特种兵团”的大多数人是被迫的,不是自愿的;2.一旦强迁这些人,其家属失去供养,将给当地政府造成负担;3.当地各民族对“特种兵团”的镇压持反对态度;4.劳动力不足影响当地经济发展。这些理由都很正当,但被莫斯科当局否决。鉴于此,爱沙尼亚共和国在决定提交同样的呈文时,决定退而求其次,请求莫斯科当局同意将清洗的富农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安置在爱沙尼亚境内。苏共中央高层经讨论后,决定以爱沙尼亚共和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诉求为由而采纳。显然,莫斯科当局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政府的一致行动持保留态度,但也顾及到国际影响。针对各地发生的反苏事件,各共和国领导人的处理意见也极为相似,都在有意保护当地人利益,防止事态进一步激化。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特派员季玛娜考察阿伯连县,她想实地采访农庄时遭严词拒绝。返回里加后她这样评论:苏维埃政权在县以下层级都软弱无力,县苏维埃只是联系各乡苏维埃的政治中心,农村的反苏气焰特别嚣张,根本无法与村民对话。^[16]

各国反苏活动制约了农业集体化的推进,直到1947年5月21日,苏联政府才颁布《关于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建立集体农庄的决议》。但农业集体化的推广工作步履维艰,到年底三国分别建立了30、34、37个集体农庄。到1949年初,立陶宛有3.9%的农户、爱沙尼亚有5.8%的农户、拉脱维亚有8%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苏联政府试图增加税额对反集体化者施加压力,但并未奏效,又招致新一轮的议抗活动,最后只能在这一地区实行特殊政策,即部分地推行集体化。^[17]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抵抗运动持续八年,失去了西方支持的立陶宛“林中兄弟会”到1952年被苏军歼灭,残余势力一直坚持斗争到1961年。许多反苏分子被迫选择了合作,等待时日再战。与强大的苏维埃政权继续斗下去无疑等于自杀,实用主义的自我保护才是明智的选择。不过,放弃公开的和地下的斗争并不等于心悦诚服地接受苏化政策,反苏社会

意识仍以隐蔽的形式延续下来,延长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确立苏维埃制度的进程,苏化任务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期也未完成。

[参 考 文 献]

- [1] 阿里吉尔达斯·勃拉召斯卡斯. 立陶宛式分离及其后来 [J]. 国际生活, 1994(4).
- [2] 乔夫里·霍斯京. 1917—1991年苏联史 [M]. 莫斯科: 瓦格留斯出版社, 1994: 259.
- [3] 巴·普什卡廖夫. 俄国共产主义制度与人民的反抗 (1917—1991年) [M]. 莫斯科: 播种出版社, 2002: 56.
- [4] 勃·盖纳基. 俄国史的新世界 [M]. 莫斯科: 《阿伊洛—20》出版社, 2001.
- [5] 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全苏共产党(布)中央执委会人事部工作报告(1945—1946年) [B]. 莫斯科: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全宗 600, 目录 1, 案卷 2: 23.
- [6] 1945年3月联共(布)中央人事局副局长安德烈夫向联共(布)中央书记马林科夫报告记录 [B]. 莫斯科: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全宗 17, 目录 117, 案卷 498: 8.
- [7] 拉脱维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人事部工作报告 [B]. 莫斯科: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全宗 600, 目录 1, 案卷 2: 53.
- [8] 1945年7月立陶宛全苏共产党(布)中央执委会工作报告 [B]. 莫斯科: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全宗 17, 目录 1, 案卷 2: 35.
- [9] 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联共(布)中央执行局总结资料, 1945—1946年全苏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人事部回复资料 [B]. 莫斯科: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全宗 597, 目录 1, 案卷 2: 22; 全宗 598, 目录 1, 案卷 2: 25; 全宗 600, 目录 1, 案卷 2: 23.
- [10] 1947年立陶宛党组织构成的统计报告 [B]. 莫斯科: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全宗 597, 目录 1, 案卷 21: 83.
- [11] 1956年立陶宛党组织资料 [B]. 莫斯科: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全宗 5, 目录 31, 案卷 59: 107.
- [12] 贝利亚与 1946年7月彼洛夫呈日丹诺夫的报告记录 [B]. 莫斯科: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全宗 588, 目录 1, 案卷 16: 39.
- [13] 美·罗伯特·康奎斯特. 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 [M]. 刘靖北, 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17.
- [14] 1946年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干部工作汇报 [B].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全宗 597, 目录 1, 案卷 22: 77.
- [15] 1941—1952年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和亚美尼亚以行政程序强迁平民资料汇编(1965年整理) [B].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全宗 7523, 目录 109, 案卷 195: 51—55.
- [16] 塔·沃洛季金娜. 斯大林与40年代末克里姆林宫战略方针的转变: 从妥协到对峙 [M]. 莫斯科: 科学出版社, 1999: 6.
- [17] 1947年6月4日鲍尔科夫向苏斯洛夫汇报记录 [B]. 莫斯科: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全宗 17, 目录 17, 案卷 869: 197.

On Sovietisation of the Three Baltic States

Fu Shi-ming

(School of Culture and Tour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1,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ideology had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three Baltic coastal states, because they entered Soviet late and we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re existed long-standing anti-Soviet forces. Soviet government violently moved anti-Soviet forces and reinforced Party building through bilingualism and immigration to increase Sovietisation. Thus, authoritarian power led to the forming of regional nationalism. Soviet's gentle and stern measures did not succeed; instead, the three Baltic states played a vanguard role in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Key words Soviet Union; the three Baltic coastal states; Soviet; Russianization

[责任编辑 刘文俊]